

親父念思

想起父親，總難免想起那個月黑風高，兵荒馬亂的夜晚，爸爸那時候任職國民黨重慶市黨部書記長，在共軍沒有進城前，母親帶著我們四姐弟搬到人地生疏的成都去避難。有天晚上，我們被一陣緊急的敲門聲吵醒，父親穿着一身棉軍服，腰間別着一管手槍，開門後急急忙忙地閃了進來。父親和母親關着門輕聲談了一陣後，又匆匆忙忙地離去。很多年後當我們都長大成人了，談起往事，才知道那時候父親有去臺灣的飛機票，在四個小孩中只可以帶兩個走，母親因捨不得丟下兩個小孩，結果我們姊弟都沒有走，只有爸爸一個人隨政府去臺灣了。

第二次見到父親，在基隆的碼頭上。記得當年，父親離開四川之後，成都很快也就淪陷了。一年後的某天，母親突然接到爸爸從香港的來信，要我們去香港和他見面。為了掩護身分，母親每天提着前晚新剝好的蠶豆到市場去賣。那時候正是中共醞釀三反五反的前夕，爲恐夜長夢多，只好繞道由成都坐老爺公車翻過秦嶺到寶雞，

再從寶雞橫貫大陸到河南的鄭州，經平漢鐵路到漢口，接粵漢鐵路南下到廣州，關山萬里，一路上披星戴月，不知晝夜，好不容易才到達廣州。記得在寶雞上火車時，天不見亮，黑矇矇的火車

昇火待發，興奮中帶着滿懷恐懼。車過黃河大橋，只見滾滾黃河，滔滔江水，故國的風景人物，在記憶中似乎還留下難忘的印象。那時候我們四姐弟，大的才十歲出頭，小的才兩三歲，年少無知，那能體諒母親的心情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一生的命運，在爸爸的一封信，母親的一個決定就已經註定了。

當時爸爸的來信，說他會來廣州車站迎接我們，而事實上那時候他正在臺灣工作而忙碌，根本不可能到廣州來，但爲了鼓勵母親帶着我們上路，信是從香港託人轉寄來的。就這樣害得我母親和姐姐天天去車站等人，等不到回旅館大家抱頭痛哭。在人地生疏，言語不通之環境下，着實使我母親也受了不少悶氣。眼看身上的錢快用完了，擺在母親面前只有兩條路，一條是帶着我們再回四川；另外一條就是不顧一切買票搭船去香港再說。最後母親選擇了後者，船到香港才知

思

念

父

親

羅家鵬

道進入香港要入境證。匆忙中我們那有什麼入境證，也許是海關看我母親孤寡一人，帶着四個黃口幼子，就很同情心和人情味的讓我們上了岸。

到了香港，找到了轉信的張伯伯，才知道爸爸是在臺灣，這樣心才安定下來。一家五口在九龍青山道租了一間房間，一張床，無電無水，母親爲了提水，右肘關節脫臼，至今仍在痛苦中，就在這樣情形下等臺灣的入境證。後來張伯伯宦途失意，經商失敗，妻離子散，潦倒半生，晚年全靠父親及其他朋友照顧。張伯伯在臺去世的後事由爸爸主辦，並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文章來追悼一個懷才不遇、命運多乖的老朋友，雖云悼人，實也悼己。爸爸終是一個念舊的人，如果他生在一個太平的時代，我相信父親會是一個很出

羅家鵬先生：四川瀘縣人，國立政治大學學士，美國加州大學碩士，前台灣省青年服務團副團長，台灣東部防守區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羅才榮先生之公子，現任電腦工程師。

色的文人。只可惜他生在一個身不由主的時代，承擔了新舊兩代過渡期間承先啓後的角色，從二十幾歲投筆從戎，到七十多歲老死臺灣，五十幾年，沒有一天離開過革命的行列。

最早的時候，是在圓山附近協助上官業佑先生辦青年服務團，收留和訓練大陸流亡之來臺的青年學生。後來調到花蓮任東部防守區司令部政治部主任。那年正好遇到花蓮六級大地震，爸爸帶着東防部的阿兵哥們，不分晝夜為老百姓服務，對安定人心、團結軍民有很多貢獻。

我讀初一的時候，爸爸調回臺北，前後任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二組及中央黨部第一組副主任，替谷正綱先生、倪文亞先生及唐乃建先生任副手。那時爸爸才四十出頭，算得上當時的青年才俊，後來高玉樹先生首次以無黨籍人士身份當選臺北市長，爸爸奉令兼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，以期在議會和黨政關係上多做一點工作。那時我們家在中山北路三段一幢平房裏，每次下大雨，總會淹水。有次高市長星期天打電話來找爸爸，電話是我接的，當我告訴高市長爸爸去菜場買菜去了，高市長言下頗為詫異。爸爸任黨政重要職務半輩子，始終保持平民的生活，和老百姓平起平坐，令我們作子女的非常敬佩。

在我讀大三的時候，爸爸在臺中擔任臺灣省黨部書記長，那可能是爸爸事業的最高峯，但在另方面，爸爸因整天在外面忙開會和應酬，父子之間很少有機會面對面坐下來好好聊一聊。機會，就是每年過年前後爸爸總會帶着我們全家到全省有名的風景區去玩。八仙山的巨木、石門

水庫的浩瀚，跟着爸爸上山下海都統統跑遍，在不知名的招待所的豆棚瓜架下，在叢林深處，星光燦爛的夜晚，不止一次的聽爸爸講讀書時代和八年抗戰的故事，穿草鞋，打綁腿，跑警報，吃的慘綠少年來說，復興關、沙坪壠，到底比逛西門町、追女朋友、上補習班準備留洋來得遙遠。「八寶飯」。對一個在臺灣安樂中長大的十幾歲

的性格，和自以為是自由主義和人文思想的臭脾氣作怪，替爸爸惹來不少麻煩，但爸爸始終對我相當容忍，只是對我將來以長子的身份，繼承衣鉢，走他走的道路的願望，越來越沒有指望……

我出國的前一年，爸爸被調回中央黨部設考會當副主任委員，爸爸那時精神體力都在旺盛階段，突然從一個搞組織、講行動的「戰場」，轉到設計考核的幕僚工作，一做就是二十年，那絲寂寞和無奈，偶爾在父子越洋的郵筒中不難體會得出。

再加上年歲日長，子女成人，離家在外，有段時間爸爸很鼓勵我學成回國，但我有自知之明，總以性格不合的理由，寧願在美國海闊天空過落花飄零的生活，爸爸勸了一陣也就不再勸了。

出國後第一次見到爸爸，是來美後第五年，他趁美國務院邀請之便，特別從東部一個人飛到

陌生地來參加我的婚禮。在支加哥接機，突然間我發現父親老了很多，和我離開臺灣時恍若兩人。海外重逢，有說不盡的話談，還記得那天正下着大雨，邊談邊開車，走錯了路也不知道，害得爸爸

在九十號公路上轉了一個大圈。對一個六十歲的老人家，這趟遠行相當辛苦，言語不通，飲食不便。我那時候剛從學校出來做事不久，在經濟毫無基礎之下結婚，當一切都已經決定了之後，才知道未婚妻是香港殷商的千金，婚禮前女方父母兄弟從香港和美國各地趕到，在威州大學附近租了一幢房子，好不熱鬧。爸爸一個人住在教堂附近的一個小旅館裏，相形之下，不免黯然。結婚費用也大部份由女家支付，我為婚禮之事，忙得昏頭轉向，也沒有工夫招呼他老人家。最荒唐的是，我自以為瀟灑，穿了一雙新換了底的舊皮鞋上教堂，我跪在上面，一雙舊底鞋，黑白分明

，爸爸坐在臺下，看在眼裏，痛在心頭。

爸爸一生從事黨務工作，收入不多，幸好母親後來補上國大代表，生活才稍見寬裕。父親去世，除少許的撫恤金外，沒有任何遺產留下來。以父親少年得志，身居要職，要想利用職權營私自肥，不是沒有機會。但他始終為官清廉，我出國的三千保證金幾傾全家所有，後來弟弟們出國，父親就再也拿不出保證金了，全靠我母親去張羅。父親晚年，我們搬到加州定居，歲月不居，我也進入中年，自己做了父親，才領略到當年父親整天在外奔忙，不能享受家庭生活的苦衷。美國生活舒服，物質享受豐富，好幾次寫信勸爸爸乾脆退下來，到美國來和我們同住，但是爸爸始終不答應，也不說為什麼。也許是天生傲骨，不願意靠子女養老，也許是内心中仍不服老，在事業上還想有一番作為。這時候父子見面，全靠每

父親總抽空陪我玩。他知道我從沒去過金門，特別打電話給王化行將軍，靠老面子為我安排去金門看看。我也知道，爸爸總怕我變成數典忘祖的假洋鬼子。

這個時候，臺灣的政壇和黨務界，很多年輕的留學生竄了起來，有的是我以前的同學和朋友。爸爸以望七之年，每天仍然從中央新村去中央黨部上班，沒有牢騷，也沒有自怨自艾，默默地盡他的本份，有的時候為了趕寫黨的重要文件，而使兩眼發紅也不為苦。我每次回家看他，總是遇到下雨，斜風細雨中陪爸爸在中央新村的街道上散步時，很多時候，談到我們這家人一生的遭遇，我總是安慰他，勸他放眼看一下有多少人沒我們幸運，雖然歷經戰亂，但我們全家都平安到了臺灣。在爸爸的同輩中，多少人倒下去了，爸

還始終能站起來，四個兒女雖沒一個有大作爲，但個個也都能獨立自主，堂堂正正做人。然而內心中，我總覺得父親很寂寞，除了上班外，他幾乎沒有他可以消磨時間填補空虛的嗜好。大夫無私交，人情冷暖，他們這一代那有多少肝膽相照的友誼可言？想子女們回到身邊，但又不願意強迫子女們的自由意志，這種矛盾和寂寞，在父親生前的最後幾年更是濃得難以化開。

每年過年，我都會打國際電話回家，這是來美國後養成的傳統和習慣。民國七十年，接到母親的信說過年會出去玩，叫我不要打電話回家拜年。其實那時候，父親已因長年的心臟，血壓糖尿病，引起了尿毒昇高，突然昏倒，進了醫院，母親怕我們在外耽心，不讓我們知道。

再看到父親的時候，他來美國看病，希望有什麼特效藥，能對他的病有所幫助。在舊金山接機，見到的是個走路都有困難的老翁，看病的結果，醫生都說沒救，風篋殘燭，祇不過時間問題而已。爸爸雖然聽不懂英文，但心裏有數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那時爸爸以多病之身，力排衆議要來美國，也不過是想和他在美國的三個兒女再見一面罷了。也許是看病無救的打擊，也許是怕生病連累了我們的壓力，有一天他再次昏倒送史坦福大學醫院急救。在急救室中，我從頭到尾都陪他。實習醫生一個個進來，問同樣的話，作同樣的檢查。第一次看見父親衣服脫下後的身體，皮包着骨頭。爸爸那時候已經瘦得不到一百磅了。雖然生命已經快走到了盡頭，他仍然不服氣，既不抱怨，也沒有不耐煩。我從小和父親聚少離多，

習慣上不知道該說什麼話來安慰他。倒是那個年輕的主治女醫生問我，當晚如有危險，要不要救，我很詫異她會問這句話，於是毫不考慮地回答說：「當然要救。」她說：「你還是問問你父親好，他也許對活着的意義看法和你不一樣。」「今天我還是找不出答案。什麼是活着的意義？」

爸爸好吃，曾對中國菜的改良費了一些心血，最後一兩年，想吃不能吃，想玩不能玩，就是洗澡都要人家幫忙，難道說他活着已經沒有意義了嗎？誰能做這個決定呢？父親從史坦福醫院出來，因買不到保險，祇好回臺灣養病。承孝裕兄幫忙，親自來機場說人情，希望將父親安排在頭等艙位。正推着父親的輪椅穿過機場的長廊時，華航的經理正好經過來打招呼說：嚴先生交待的事已經辦妥了。爸爸把帽子脫下來向他致謝，幾乎全禿的頭頂，稀稀疏疏的還有幾根白髮，使我一陣心酸從心頭湧起。

一、  
羅熊啓琳  
才榮逝世週年紀念

共泣牛衣五十年，悲歡離合兩相憐，  
歸林痛折雙飛翼，魂斷高樓怕聽弦。

二、  
問字樓中碎墨香，揮毫走筆舞龍翔，  
而今鎮紙成追憶，天娛良才怨恨長。

三、  
一年歲月秋風裏，細雨黃昏情不已，  
立遍門牆空悵望，千帆過盡烟波起。

問字樓中碎墨香，揮毫走筆舞龍翔，  
而今鎮紙成追憶，天娛良才怨恨長。

父親當年，也算得上政壇紅人，如今是壯士晚年，英雄末路，靠兒子的朋友照顧，雖說是爲了孤正丘首，但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才回臺灣。在美國沒有保險，怕我們經濟上負擔太重。我因公事在身，不能送兩老回臺，祇好請珞珈代勞。爸爸心裏也知道，這次分手，今生是否能够再見，都很難說，上機前我自動去擁抱他。生平第一次擁抱父親，有記憶以來從沒見過父親流眼淚。看見父親用手擦眼淚，再加上我太太和小孩在旁泣不成聲，生離死別的悲哀，一齊擁到心口上，就這樣揮手送別了爸爸。此後兩年，我每年都帶着

兒子回家看父親，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仍然像做客一樣，每次離開，爸爸總要去機場送別。好不容易才勸住他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在家門口道別，我總不敢用正眼看他，「明年再回來，你好好保重。」我如此說。「等我病好些後我一定到你家長住，看看你家後院的桃花。」他如是答了。晚上陪他散步，從家裏走到中央新村的公車站，幾個老朋友在車站的長椅上坐坐聊聊，車輛經過時，塵土飛揚，我常勸他們換個地方。大家聊的時候，爸爸多半祇有聽的份。有時兒子和我們一道，祖孫三代從街道中漫步回家，兒子心好，常手牽着公公。我們羅家，本來是大族，歷經戰亂，碩果僅存，能到臺灣的，也不過是我們一家。過完聖誕節後，我回到美國，一月二十八日，父親在臺北去世，和上次見面前後不到一個月。在殯儀館看爸爸的遺容，瘦小的身體，枯乾的面龐，和我最後一次看到他，也沒有什麼大區別。自從那次在舊金山機場送別後，我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到，由於爸爸堅強的意志，他在這個世界上，多掙扎了三年。把爸爸的骨灰從火葬場裏檢起來，裝在一個罐子裏，「七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，爸爸就這樣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。

從某些角度上看，我始終認爲父親和他代表的那一代，在我國的近代史中扮演着無可奈何的角色。他們生晚了十幾二十年，開國的功勳、東征北伐的榮耀輸不到他們身上。盧溝橋的炮火，

打斷了他們讀書、出國學一技之長的機會。基於愛國情操，投身在抗日的洪爐裏，用鮮血和頭顱換得了八年抗戰的勝利。接着的又是戡亂，多少人拋妻離子，離開了他們生於斯，長於斯的土地，來到臺灣，一切從頭做起。他們雖沒有負大陸失掉的責任，但總洗刷不掉把大陸丟掉的責難。

在風雨飄搖鶴鳴不已的緊要關頭，是他們那代把政局安定下來，新生命在臺灣生根發芽，播種者是他們那一代。當那些在臺灣安定的環境中，受完大學教育出國留洋回國的新生代竄起來後，他們又默默地被拋在後面。歲月不饒人，時代的巨輪超越了他們。年輕的時候，因公忘私，在意識中，根本不能夠享受家庭的溫暖。年紀大了以後，子女們一個個東飛西散，一家人難得聚在一起，更不要說享那兒孫承歡膝下的福份。爲了保守那份彌足珍貴的晚節，不願飄洋過海，寄居異域，拿永久居留，領社會福利金終老。

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他們却永遠爲別人而活。爸爸一生除參加我的婚禮外，沒有進過教堂，想起爸爸，總想起聖經中保羅受難前講的話：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。……爸爸，你好好安息吧！

爸爸一生除參加我的婚禮外，沒有進過教堂，想起爸爸，總想起聖經中保羅受難前講的話：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。……爸爸，你好好安息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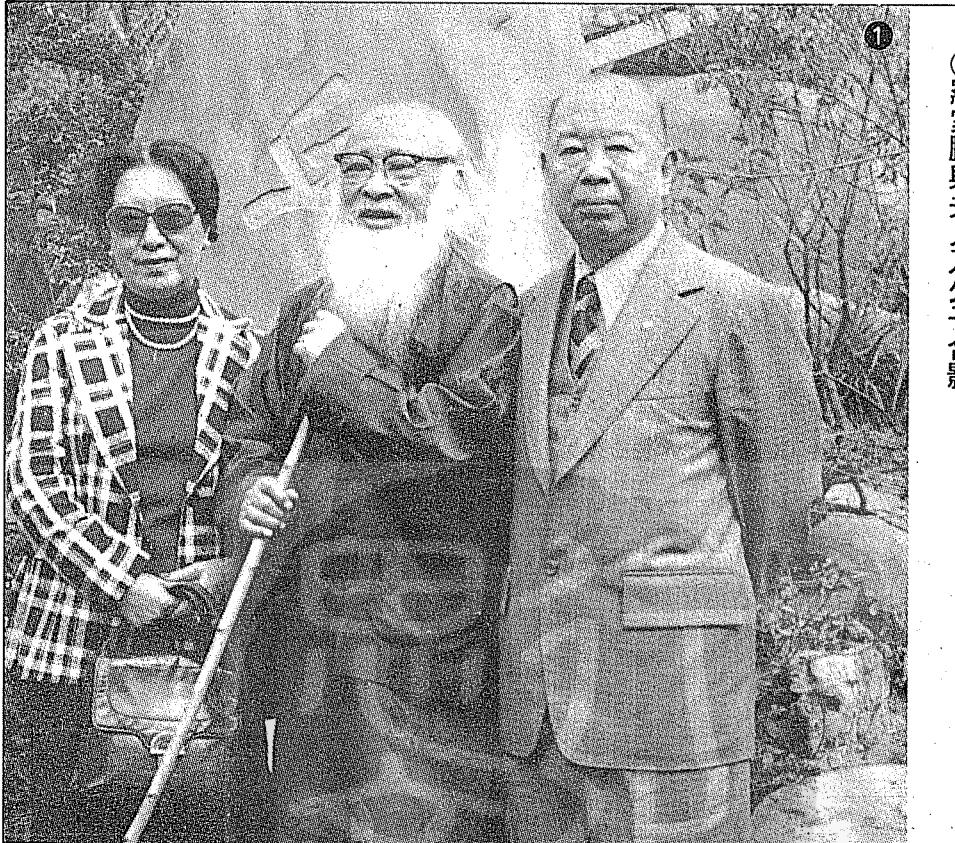
# 大專最新應用文

用書 邵健行 著

定價台幣壹佰伍拾元

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種類。書信的種類、結構、術語。便條。名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啓事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

①右起：羅才榮、張大千、羅熊啓琳。



②羅家鵬與夫人及公子合影。